

我国语言教育的 两次转向研究

WOGUO YUYAN JIAOYU DE
LIANGCI ZHUANXIANG YANJIU

王丽波 著



语文出版社

我国语言教育的 两次转向研究

王丽波 著



 语文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国语言教育的两次转向研究 / 王丽波著.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80241-764-9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语言教学—教学研究—
中国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5654号

责任编辑	张夏放
装帧设计	刘姗姗
出版	 语文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cbssywp@163.com
排版	语文出版社照排室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格	890mm×1240mm
开本	A5
印张	12.375
字数	245千字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5.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1033(购书)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序一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 卫灿金

丽波是我的硕士研究生，我想借这个机会先说说他的学术成长之路。

丽波 1999 年来到山西师大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2003 年又以总分第一（专业和英语成绩均第一）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山西师大文学院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统招硕士，成了我的研究生。硕士三年他博览群书，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异，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在研二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丽波在读硕期间，对在语言学背景上探讨我国语言教育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2006 年他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我国语言教育的两次转向及未来走向研究》，获得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毕业时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到山西晋中学院文学院任教。虽然教学、科研尚处起步阶段，但由于能沉下心来专注研究，对课改实践敏于观察和思考，五六年的时间，便在《语文建设》《语文教学通讯》等刊物发表了 10 余篇学术论文，其中有 3 篇为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论文，有1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近年来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还主持了几项省级和校级课题。我心想，丽波也如小荷初露，相信会逐步展现出他科研方面的才华。

今年，丽波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郑国民先生做访问学者。令我没想到的是，前些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想请我为他撰写的著作作个序。谈话中得知，这本著作是他毕业后继续沿着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辛勤研究写成的。我听之后，作为他的导师，心中真为他的快步成长感到特别高兴。

在语文教育上，我是一个语言、思维、人文三位一体，三者统一的教育论者。多年来，我一直侧重于语文思维培育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感到语言教育的重要。自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以来，语言教育可以说是语文教育研究范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而一直是语文教育研究一个热点问题。在20世纪，我国语言教育比较重视语言知识教学及语法教学，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语言教育趋向于语感的培养。近年来，由此而引发的有关语言知识、语法、语感关系的种种争议，也给广大语文教师带来很大的困惑，这就使语言教育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受到了语言学界和语文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正因为如此，丽波硕士论文选这个题是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但我深知作为一个硕士生这块硬骨头是不好啃的，而我之所以同意并支持他做这一

块的研究，并不在于他的论文能够达到多高水平，更主要的是想在毕业前夕给他能初步确立一个相对长久而稳定的研究方向。工夫不负有心人，当我拿到他的书稿一页一页翻阅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一个新生的婴儿呱呱坠地，这是一个导师面对自己弟子的成果难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

书中的第一章《我国传统语言教育概述》，翔实的资料和深入的解读，使我们看到了我国几千年传统语言教育中语感教学一脉相承的历史源流，这一史料的梳理与所得结论，使我们自然感受到作者所得出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语感教学的回归”这一推断的合理性。

第二章《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第三章《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潮下我国语言教育的第一次转向》，在介绍、分析和评价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着重历史地叙述了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我国 20 世纪语言教育所发生的深刻影响，并由此得出第一个重要结论：“就我国语言教育而言，以章士钊 1907 年出版《中国国文典》作为中学堂、师范学堂的教科书和以黎锦熙 1924 年出版《新著国语文法》作为学校语法教材为标志，我国语言教育从过去的传统语言教育开始了向结构主义现代语言教育的第一次转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过西学东渐促使我国语言教育由经验型的传统语感教学向语言结构分析科学化历史转向的必然性，同时作者也客观地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以及语文教学中语言分析过度化的弊病。

第四章《解构主义语言学》和第五章《解构主义语言学思

潮下我国语言教育的第二次转向》，进而介绍、分析和评价了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解构主义语言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重点论述了20世纪80~90年代，在解构主义思潮下引发的我国关于语法教学和语文学科性质的大讨论，对结构主义语言教育观缺陷的反思与批判。“这也预示着语言教育将迎来一场新的、更大的变革，即我国现代语言教育的第二次转向——由结构主义语言教育观转向解构主义语言教育观。”

第六章《语言教育未来走向分析》，则是作者在上述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语言教育发展的预测：在21世纪，语言学将是“结构—解构”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时代。基于对语言学未来发展的如此认识，同样，语言教育的未来发展也将必然走向一个“结构—解构”语言观下的结构主义语言教育和解构主义语言教育相统一的全新时代。这个对我国21世纪未来语言教育走向的预测，因为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与推论，所以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合乎时代发展逻辑的，是科学的。这一章也是体现作者著述意图和全书的重心所在。

总之，这本著作从语言学与语言教育、语言学发展与语言教育发展的关系切入，论述了我国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来语言教育的发展和演变轨迹，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预测了未来语言教育总的发展趋势和走向，这对我们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清醒地认识当前所出现的各种语言教育思潮和对未来语言教育发展的研究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正因为如此，我希望这本著作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关心和喜爱。

丽波的这一成果使我欣喜，作为导师，我祝贺他；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些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我希望他能够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沿着既定的方向，耐得住寂寞，扎扎实实，不断开拓，勇于创新，攀上一座又一座新的高峰。是为所盼。

2012 年 12 月 8 日于天津寓所

序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国民

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语文教育发展历程，无疑是语文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自从西方语言学开始传入我国，很多学者把语言学研究 and 语文教育结合起来，试图解释或解决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并深刻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与变革。

在 20 世纪末，人们反思语文教育百年发展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有人曾对语言教学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语文教育之所以出现严重偏差和失误，就是照搬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和语言教育理论，将其硬套到汉语言研究和汉语言教育中。如在语文教科书中编入系统的语法、修辞等知识，教师对这些概念性知识进行详细讲解并要求学生进行记忆，在此基础上进行反复、大量的操练。在日常评价和中小学毕业考试的语文试卷中，这样的试题也占据了重要的比例。在这样的背景下，生动、鲜活并富有生命体验的文学作品被肢解成了毫无生命力的语言碎片，教师进行分析、分析再分析，学生模仿老师的套路

进行操练、操练再操练。因此，语文课成了语言分析课、语言操练课，学生宝贵的时光和青春湮没在了无休无止的试题卷子中。因而也就没有时间读书，没有机会互相交流那些经典课文的神韵、意义，更谈不上探讨文章中所蕴含的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典型体验和智慧。在学生眼中，优美的文章不再焕发着亲和力和生命力，只是进行语言分析和操练的例子而已。

暂且无论这样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或者类似的批评是否太言过其实，但是发挥的警醒作用较为显著，提醒并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认识语言教学在语文教育的功能与价值。有的学者认为，近现代以来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很难适用于汉语言研究和语文教育，不应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而应改弦易辙，从我国传统语言研究着手，充分吸收和运用传统语言教学理论，再造当下语言教学。也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沿用原来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教学理念，但要改造原来的语言教与学的过程与方法，不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那些语言概念，而是让学生从大量鲜活的语言现象和语言运用中逐渐总结、概括语言特点和规律，从而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当然，也有的学者和老师认为应保留原来的语言教学，因为淡化语法、修辞知识等语言教学，使教学没有抓手，无法操作。特别是在重点词句的教学以及作文修改中，学生如没有这方面知识，教师讲这些内容时学生听不明白。还有人认为，当下的语言教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淡化的问题而应大力加强，可借鉴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作法和外国语言教学经验，把文学和语言教学分

开，专门编写语言教科书。

坦率而言，面对这些观点和争论，很难做出简单的判断。因为如果没有深厚的语言学修养，不熟悉西方语言学理论在我国传播和研究发展历程，以及中小学语言教学历史，是无法做出深入的分析和恰切的判断。至少于我而言，这个问题令人敬畏。也正如我曾经感慨的那样，站在语文教育“大象”前，除了深感敬畏和渺小之外，只能是如盲人般将自己摸着的象腿或象鼻都认为是大象的全部。

难能可贵的是，广大的语文教师和学生，从他们自身教与学体验中总结出来的认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视角。如很多老师和学生曾感叹，在中考和高考准备阶段，如果带领学生集中练习修改各种各样的病句 200 道试题，这时给出一个正确的句子，大多数学生也迅速断定这是一个病句。同时，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有的老师在为学生讲病句类型时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自己写出来的文章却病句连篇，正是自己讲过的那些病句。因此，语言知识到底发挥什么作用，怎么学才有用，成为探讨语言教学的本源问题。

在语言学面前，我是门外汉，只是曾经读过乔姆斯基等学者写的一些书。除此之外，我指导研究生做过一些简单的探索。如病句修改与中考、高考中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相关性分析，以及小学三四年级学生作文中的病句、修辞、错别字的量化分析，一些研究结论非常令人寻味。例如，在小学三四年级学生作文中常见的修辞方法如比喻、拟人、排比等大量出现，并且

得体恰当。学生说不出来使用了什么修辞方法，但可以很熟练地使用。另外，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如果让学生判断是什么修辞方法很容易出现错误，但是如果让学生从表达效果的角度进行表述却很容易。还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那些阅读量多、写作能力高的学生，往往在基础知识部分如字音、字形、字义和修改病句方面容易出现错误并丢分。我们试图从这样的角度去解释、探索语言教学问题，但深知其复杂与艰难，有时令人望而却步。

王丽波老师是山西晋中学院文学院的教师，2012年9月受教育部资助，来北京师范大学做高等院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我有幸成为他的指导教师。近日，丽波老师说他的专著《我国语言教育的两次转向研究》就要在语文出版社出版了，想请我为他的专著作序。我当初不敢答应，一是因为我觉得还没有为别人的著作写序的资格，二是我在这方面的确没有什么研究故不敢妄加评说。但是，丽波老师恳切之情难却，只好从命。

我认真阅读了全部书稿，认为丽波老师专著中的观点和论述对当下的中小学语言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前瞻性，非常值得语文教育研究者和中小学语文教师认真研读。在此，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汇报自己的一些认识和作法，以求和丽波老师的专著一起就教语文教育界同仁。

2013年5月28日

前 言

1904 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校实行分科教学，从此语文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今天，现代语文教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

进入 21 世纪，2001 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03 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和 2011 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三部课程标准的颁布，在语文新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广大语文教师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关系、语言的知识教学与语感培养的关系、多元理解、多元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不少新的疑问。于漪老师曾指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门科学的成长，总是与‘自身到底是什么’的争论相伴随。”^①在语文新课程实施伊始出现种种困惑与疑问是十分正常的，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正预示着课程改革的不断突破与进展。

在诸多问题中，语言教育可以说是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问

^① 于漪. 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 [J]. 语文学学习，1995，(6)：4.

题。比较研究 20 世纪的历次教学大纲和这次颁布的三部语文课程标准,从中不难发现:自 1956 年《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颁布,我国语言教育开始有了一个可以遵循的、权威的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其后 30 多年里我国的语文教学大纲都十分强调语法知识的教学。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语言知识教学及语法教学的力度明显减弱,尤其是三部新课程标准的颁布,更显示出语言教育趋向于语感培养的重心转移。近年来,由此而引发的有关语言知识、语法、语感关系的种种争议,使语言教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正如语言学家伍铁平所说:“语言理论往往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获得思路的启发,评价语言理论不能脱离它的哲学思潮的背景。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的好些哲学流派都十分重视语言的分析 and 阐明,认为只有通过语言分析,才能澄清或解决哲学问题。”^①而语言教育又与语言学思潮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语言教育的种种理论的提出都是语言学思潮影响的产物。因此,面对当前语言教育的种种问题,本书力图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解构主义语言学以及我国的文化语言学对我国语言教育两次转向的影响,尤其是对当前语文新课标的重大影响进行总结与反思,并由此对语言教育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作出分析,以期对语言教育能够有一个科

① 伍铁平. 普通语言学概要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35.

学的认识。

一、问题提出的缘由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关于语文教育的讨论，也变得越来越热烈，尤其是语文新课程标准关于语言教育的规定，可以说见仁见智，褒贬不一。语文新课标在实施的过程中，语言教育中的一些尖锐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语法、修辞、逻辑知识到底讲不讲，讲多少；语感教学应不应该成为语文教学的中心，语感教学的可操作性如何把握；如何测量，如何保证语言教育的质量，这些都成为目前困扰语文教育，尤其是语言教育的难题。许多语文教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彷徨，他们觉得“语文越教越不知道该怎么教了”。

我们首先从语文学科名称的由来谈起。

“语文”这一名称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对此，叶圣陶有过如下的说明：“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个名称是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用起来的。解放以前，这个学科的名称，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解放以后才统称‘语文’。”^①

由叶老的论述可以看出，“语文”的名称，正确地概括了该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38。

学科进行语言全面训练的特征。它不仅吸收了“五四”以来国语和国语教育运动的成果，而且体现了老解放区国语、国文课充分重视口语教学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一名称明确规定了从小学到中学都必须充分重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全面训练的重要任务，并以此来确定学科的主要教学目标。^①

语言教育是中学语文教育的核心。语言教育贯穿于听、说、读、写教学的过程中，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人的语言水平决定着他的语文水平，所以，从1963年以来的语文教学大纲在“教学目的”里首先要求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一规定表明了语言教育在中学语文教育中所应具有的核心地位。

回顾历史，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语言教育长期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注重的是语言知识教育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强调的是语言的系统训练。20世纪80年代之后，受西方解构主义语言学思潮的影响，我国的文化语言学思潮也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蓬勃发展起来。结构主义语言观与解构主义语言观的冲突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大讨论，在这一讨论中人文性与工具性相对峙，受人文性的影响，“淡化语法”“培养语感”的呼声也随之而起。新课标正是在这种两种语言观、两种语文性质观和两种语言教育观

^① 李杏保，顾黄初.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 [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340.

的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步入前台的。正因为如此，新课标实施中语文教师出现上述的迷茫与彷徨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本人选择这一论题开展研究，正是基于目前新课标实施中语言教育出现的种种认识问题，试图以语言教育观切入以看出问题的实质，找出问题的症结，对语言教育的未来走向做出一个宏观的分析和判断。

二、问题的意义

本问题研究的意义主要是：

第一，正确认识语文新课标关于语言教育的问题。

2001年、2003年和2011年，教育部相继制定和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随着语文新课标的颁布和逐步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开，在语言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新问题。

语文新课标突出强调了语感的培养。语感虽是语言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语感中心论片面强调了语感的作用，忽视了语言知识教学的重要性。如何正确把握语感教学与语言知识教学的关系成为摆在广大语文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通过本论题的研究，笔者试图从决定和影响语言教育变化的最根本的因素——语言学思潮的变迁来找到答案，通过科学的分析对新课标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以使我们能够客观地、辩证地看待